

内 科 学 家
热 带 病 学 家
医 学 寄 生 虫 学 家

钟惠澜

(1901.6.24~1987.2.6)

1955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钟惠澜家乡故居—梅县三乡镇石楼村继成楼

中国热带医学奠基人——钟惠澜院士

李 国 泰



钟惠澜（1901—1987），我国热带医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一位令人敬仰的医学专家。香港的《明报》曾经将他称为我国医学界的“超级巨星”。他精通6国文字，能用8种外文阅读资料。曾发表过近400篇学术论文，有过近200项发现和发明。

钟惠澜原籍在广东省梅县三乡（现雁洋镇）石楼村。1901年出生在葡属东帝汶的叻利岛。

惠澜幼年丧父，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他11岁曾只身回到香港，在一个小客栈里当童工，后从香港再赴东帝汶。13岁才得以受到启蒙教育，从东帝汶的一所五年制丙等小学毕业时已17岁了。同年回到家乡梅县的美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广益中学读书，1921年被保送到上海的美国基督教教会大学——沪江大学读书，在此期间他还要在课余时间去打零工挣钱贴补生活。

1922年暑假回到老家，钟惠澜在家乡的报纸上看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上海设考点招生的消息，就从汕头买船票到上海投考，因台风，轮船延后好几天才开，到上海时，得知已开考了二天，他央求主考让他参加考试。考官见他恳切，也是爱才心切，同意让他白天参加后几门的考试，用二个晚上补考先前二天的考题，结果还真让他考上了。被协和医学院录取后，他就到北京一边打工一边等待开学。

由于成绩优异，钟惠澜在医学院学习的8年中，得到了全部奖学金。与他同学的有后来举世闻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60年后，钟惠澜还写诗回忆当年之情：“同窗六十如一天，王府桃源隔人间。八年基础临床课，敬佩木兰素领先。”

在学校，他又是一个关心祖国前途、命运，关心政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并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协和医学院的爱国学生组成了“协医学生沪案后援委员会”，钟惠澜担任宣传



委员。他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组织救护队，进行募捐，出版刊物，并发表文章。当时参加这一活动的还有林巧稚、陈志潜、卢致德、张先林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各种瘟疫大面积流行，每年都要吞噬数以百万计的生命。钟惠澜目睹劳苦大众缺医少药，患病死亡无人过问的惨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研究治疗民众最易传染、死亡率又高的疟疾、伤寒、黑热病、鼠疫等恶性流行性传染病，他选择了热带医学专业，并在学习期间就开始深入乡村病区进行社会调查。1927年暑假，他来到广东汕头农村，不顾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艰苦，对那里流行的疟疾进行流行病学考察。在这一地区，他发现了四种能致疟疾的媒介按蚊，其中一种以前从未发现过的微小按蚊，其体积只有其他按蚊的一半大，却是最危险的恶性疟疾传染媒介。他撰写了论文《微小按蚊》，发表后，马上引起医学界的瞩目，使这位26岁的医学院学生崭露头角。

1929年秋天，钟惠澜从协和医学院毕业，并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时，他也被协和医学院正式录用，从此开始了医学研究生涯。1933年，他与相恋数年的眼科大夫李懿征在广州结婚。俩人在相恋时，懿征觉得钟惠兰的“兰”字太秀气，在情书中改为波澜壮阔的“澜”，他为了表达对夫人的爱，从此改名钟惠澜。

上世纪三十年代，华东、华北、西北等地区的13个省份都有黑热病在蔓延流行，患者多为贫苦百姓。由于缺医少药，许多染上黑热病的患者得不到确诊和治疗，多在一两年内很快死亡。有些村庄的发病率高达2%，每年全国因黑热病而丧



1963年在西双版纳景颇山寨首次发现团山肺吸虫第一间宿主——葛式拟钉螺。1968年再赴西双版纳考察（前排左二为钟惠澜教授）。



生的约有五六十万人，情况非常严重、凄惨。当时农村疫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大肚子痞(黑热病)缠了身，阎王拴着脚后跟，快三月，慢三年，不快不慢活半年。”基于黑热病的严重流行和大量死亡，寻求和研究黑热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方法，以及传染流行的各个环节，是防治疾病的关键。毕业不久的钟惠澜首先选择了这个课题。



1980年，钟惠澜与著名作家路易斯·艾黎先生（中）、著名医学家马海德先生（右一）在交谈。

当时，西方学者认为，地中海地区有两种不同种别的黑热病病原体。一种存在于病犬体内，称为犬梨什曼原虫，一种存在于病儿体内，称为婴儿梨什曼原虫。此外还认为，印度病人和我国病人体内分离出的病原体属于同一种，称为朵氏梨什曼原虫。并认为，三种梨什曼原虫分属不同种别，印度黑热病和中国黑热病的蔓延流行与犬黑热病无关。同时，英国皇家医学会和美国罗氏基金会也先后派出了三个黑热病调查团，在我国进行了长期的调查，仍无结果。由于他们根本不研究犬作为储存宿主的问题，所以都无法解释黑热病的流行原因。

年轻的钟惠澜不轻信西方学者的论断，在华北城乡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进行了一系列流行病学和临床学的观察。在深入发病率很高的京郊槐房村时，他对患者隔离治疗。他发现患者全部治愈后没过多久，又出现了新的黑热病人。他决定扩大研究范围，对黑热病患者的环境进行仔细调查，结果发现凡有黑热病流行的地区，都有黑热病犬。经过深入观察，他发现一只黑热病犬一夜之间能吸引几百甚至上千只中华白蛉。而吮咬了病犬的白蛉便感染上梨什曼原虫，感染率几乎高达100%。他在槐房村考察了三年，终于有了新发现。

以后，他又把来自病犬和病人的黑热病病原体在中华白蛉体中的变化发展过程进行了对比，发现它们的形态、感染实验动物所引起的组织病变情况、血清补体结合试验交叉反应的情况等都是一致的，从而得出这样的概念：三种梨什曼原虫(犬、婴儿、朵氏)实际为同一种病原体。

为了证明犬与人的黑热病的一致性，必须进行人体试验。钟惠澜研究黑热病过程中，自己曾受过感染，体内已产生免疫力。因此，他的夫人李懿征医生自愿接受皮下及皮内注射犬黑热病病原体，让这一实验在自己身上进行。



李懿征是一个娴静、文弱的女性，作为一个医生，她最能理解丈夫为事业献身的苦心，也永远是钟惠澜事业和生活中的知音。注射五个月后，李懿征出现了黑热病的典型症状。胸骨穿刺检查，在骨髓内发现了黑热病病原体。用骨髓接种田鼠，后者也产生了典型黑热病病变和大量黑热病病原体。这完全证明了犬、人、白蛉三者之间黑热病传染环节的关系。这一研究成果，推翻了西方学者的错误论断，在世界上尚属首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黑热病的早期诊断方面，钟惠澜首先提出骨髓穿刺法，并创造发明了一种新的黑热病补体结合试验粉剂抗原。后者效价极高，可使病人得到早期诊断与治疗，避免发生死亡。在当时被称为“钟氏黑热病补体结合试验”（建国后称为“黑热病补体结合试验”）。

在黑热病的治疗和预防方面，钟惠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建国前钟惠澜对黑热病所进行的许多研究工作，只能零星地发表论文，有些重要研究成果甚至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直到建国后，他才得以把自己在黑热

病方面的研究成果较系统地整理成《中国黑热病研究工作概论》一文，予以发表。他总结了黑热病在流行病学、免疫学、病理学、血液学、临床学、诊断学、寄生虫学、传染机制、白蛉传染动物实验等多方面研究成果，引起国外学者瞩目。为此，巴西政府于1962年通过中国卫生部和文化部(当时巴西尚未

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对他授予了特别奖状和奖章，以表彰他在黑热病科研方面的贡献。

1934年秋，钟惠澜被协和医学院派往美、英、德、法等十几个国家学习和考察。这对于33岁的钟



在菲律宾采集石蟹。



1979年，钟惠澜(左二)在菲律宾马尼拉参加WHO中心主任会议。



惠澜来说，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他第一次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走向世界。

钟惠澜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虽置身于异国实验室，却时刻关注着多灾多难的祖国。1935年，当他在德国汉堡热带病卫生学院进修时，闻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非常气愤，立即写出抗议声明发往国内。但是，他的声明非但没能寄往国内，他自己倒成了德国法西斯通缉捉拿的对象。一位好心的德国同事劝他不要参与政治，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政治，但如果有外国人进到我的国家去捣乱，我是反对的。”并对那位同事说：“如果有人侵略德国，你也会反对的。”他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感动了他身边正直的德国知识分子。他们暗中保护他，设法帮他办好了一切离境手续，使他得以脱险。在德国，他只学习了9个月就不得不中断了进修。

1936年，钟惠澜回到祖国，继续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他先后担任了内科副教授、襄教授，并兼任热带病研究室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祖国大地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饥民遍野，瘟疫横行。华北地区严重流行着回归热和斑疹伤寒，死亡率相当高。要想有效地防治这两种病，必须首先弄清它们的流行因素和传染机制。

西方学者把回归热看得相当神秘，认为人类得回归热是由病虱吮咬所致，虱子的粪便也能感染人。无论回归热患者还是病虱，在发病期，体内都存在一种螺旋体，在缓解期(无热期)螺旋体变为肉眼看不见的超显微颗粒；热症复发时(回归期)，超显微颗粒又变为螺旋体。钟惠澜经过对大量病虱进行解剖，证明病虱的腮腺、唾液和口部并不存在螺旋体，粪便中亦无活的螺旋体，不会感染人。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在自己身上养了很多病虱，让它们在7天内吮咬自己1000多次，结果并未致病。同时，他深入北平穷人集结的“暖场”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冯兰洲的协作下，他首次发现在病虱的体腔内，长期(14至20余天)存在大量螺旋体，当病虱的皮肤或黏膜被擦破时，无数螺旋体便从体腔内逸出，有感染力，能使人致病。通过研究，他还证实了回归热患者无论在发病期和缓解期，体内均存在螺旋体，只是在缓解期，绝大部分螺旋体被人体形成的免疫力所消灭，那些为数极少的螺旋体，由于免疫力形成不完全而未被消灭，不过是用一般方法不易发现罢了，根本不存在螺旋体变为超显微颗粒的情况。这些研究成果推翻了西方学者的臆见，得到国际医学界的公认，并被写进了各国的医学教科书。

由于在回归热方面的重大发现，他被热带医学界知名学者一致推荐为国际科学研究基金会获奖者，只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使授奖未能进行。

对于斑疹伤寒，钟惠澜从1936年至1942年，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病



1963年钟惠澜教授（前排左六）参加春节联欢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

因学、流行因素、传染媒介、动物储存宿主、临床现象、动物实验、诊断及预防措施等多方面的系统研究，成就卓然，对该病的防治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

钟惠澜虽有抱负、才华，却无奈生不逢时，尤其是日本侵华后，他的研究工作更受到严重阻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协和，钟惠澜等被迫离开协和，他的科研也就被迫停止。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医务人员，他来到北平中央医院任内科主任兼医监。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医院改名为中和医院，他担任了这所医院的院长、内科主任、儿科主任、热带医学研究室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院内科临床名誉主任、教授，协和医学院内科临床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钟惠澜先后担任了北京中央人民医院院长、北京友谊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所从事的医学研究工作受到政府的重视与关心，他也为人民、为医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美援朝期间，不少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对敌艰苦血战而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患了肺吸虫病。在我国接收的8000多名朝鲜孤儿中，也有1000多人患有该病。当时国际上对这种病的认识很差，既缺乏简便准确的诊断方法，又无有效的根治措施。许多病人长期被误诊为肺结核、胸膜炎、腹膜炎等，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造成死亡或残废。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卫生部特批准在北京中央人民医院成立专门研究肺吸虫病的病房和研究室，以钟惠澜为首，尽快研究出简易可靠的诊断方法和有效的治疗措施。钟惠澜在助手和同事们的协作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就出色地完成了任



务。在以后对肺吸虫病的继续深入研究中，他和助手从边疆到内地，从平原到山区，行程十几万公里，足迹遍及20多个省市，进行实地考察。共写出80多篇研究论文，研制出五六种特效药，并协助科教电影制片厂摄制了《肺吸虫病防治》的科教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发现了8种新种肺吸虫，其中5种能导致5种新型疾病，并分别研制出防治这些新型疾病的方法和药物，这在医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受到国际医学界的高度评价。

1952年，绥中地区暴发了一场原因不明的热病大流行，死亡率相当高。党中央派钟惠澜到疫区，他很快就判明该病是疟疾，查清病因，采取了果断措施，迅速扑灭了这场瘟疫的流行。

云南省的思茅地区曾是一个有4万多人口的繁荣集镇，但建国前由于疟疾大流行致使人口锐减到1000余人。因此，当地流传着一句民谣：“想到思茅坝，先把老婆嫁”，意为有去无回。1955年，钟惠澜受国务院之托，陪同印度疟疾专家对云南的疟疾流行成因和防治措施进行了考察，使国务院掌握了



1956年毛泽东主席接见钟惠澜教授(左三)、林巧稚教授(右二)等著名科学家。



1954年钟惠澜教授(左一)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医学代表团。



1954年，钟惠澜教授(左)与全国人大吴阶平副委员长(中)、全国政协常委叶道英(右)合影。



1949年，
钟惠澜在中南
海与叶剑英同
志合影。

云南省，特别是思茅地区疟疾的全部情况，对于控制和消灭当地疟疾的流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钟惠澜杰出的医学贡献，为团结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巩固边防起了积极作用。

1958年，四川的温江、重庆、乐山、雅安四个专区同时暴发一种来势凶猛的传染病，患者发高烧，淋巴腺肿大，咯血，甚至在短期内死亡。当地怀疑是鼠疫或特种流感，因而封锁了疫区。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给钟惠澜打电话，派他去疫区工作，指示他要尽最大努力控制住疾病的流行。第二天，钟惠澜就赶到疫区，经过多方面考察，很快否定了鼠疫的可能，确定这是一种名为“钩端螺旋体病”的恶性流行性传染病。由于判断正确，三天内便解除了对疫区的封锁，很快控制了疫情。周总理再次亲自打来长途电话，高度赞扬了他的工作。

在建国初至“文革”前的17年中，钟惠澜还对肝吸虫病、血吸虫病和麻风病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成果也不容忽略。

他第一次弄清了包括中间宿主在内的肝吸虫的全部生活史，并对肝吸虫病的临床快速诊断和治疗的药物开发方面做出特殊贡献。

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他于1956年首次揭露了在云南楚雄地区长期被误诊为疟疾、痢疾、肝脾大症候群等久治无效的病例，实为血吸虫病。并在疫区首次发现了血吸虫病的传染媒介——钉螺。特别是他在血吸虫病的免疫诊断方法和研制新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制了成本低廉，制备简便，便于大量生产的肝脏虫卵新抗原。该抗原不仅可以做血吸虫病血清补体结合试验，而且在适当的稀释度下可用于该病的皮内试验。1956年，此抗原经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小组鉴定后在全国推广采用，很



快满足了当时对该病进行大面积普查的需要。

在对广东等地的麻风病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研究后，他发现该病在病因学、病原体、免疫反应、免疫学诊断等方面与结核病有许多交叉，进而提出，对防治结核病有效的药物，对防治麻风病也应有效的观点，引起医学界的重视。

钟惠澜是全国政协常委，尽管他平时科研工作非常多，仍积极参加政协会议，并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自己的看法。1957年3月，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作了关于计划生育的书面发言，指出：“人口增加太多太快，对国家，对个人都不利。”他具体地算了一笔账：“我国每年能有机会就业的职工只有100多万，但每年人口增长率为2%—3%，也就是说，若对人口生育不加以限制的话，今后每年将出现1000多万无事可做的人。”当时有一种“极左”的意见认为，我国未开辟的土地面积尚有10多亿亩，只要开荒工作做得好，不一定要控制人口。钟惠澜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他说：“开荒是祖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但毕竟荒地面积和开荒的速度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人口生育如不加限制，则人民生活在某些程度上不但不能提高，很可能反而要比现在降低。”他批判了马尔萨斯以战争、瘟疫、疾病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反动学说，同时也指出：“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繁殖(若不加以控制的话)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加的观察是正确的。在经济和科学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工农业生产增加的速度是算术级数的，而不是几何级数的那样快。也似乎不无理由。”因而他得出结论说：“中国人口基数很大，目前增加率太快太多，故应该辩证地采取有计划的控制生育政策，以便积累大量的资金，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日胜利完成。”钟惠澜所提的意见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但他却因此被污蔑为“肆无忌惮地宣扬马尔萨斯人口论”，在“拔白旗”运动中被当作“白旗”而受到严厉批判。

1963年，在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上，钟惠澜再次发言，强调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并就人口比例、地球面积与耕地面积的问题提出建议。30多年过去了，他的观点得到历史的证明。现在我国人口的数字恰恰与他当年推算的数字相合。



1980年8月，钟惠澜（右二）在日本静冈县肺吸虫流行区采石蟹时留影。



钟惠澜博士自入读北京协和医学院后，由于经济原因，很少回家，在毕业前的1928年暑假回来过后，一直没再回来，他念念不忘家乡的客家乡音，家乡的一山一水。1963年12月中旬，乘在广州讲学的机会，他与夫人李懿征终于回到了阔别了35年梅县三乡石楼村老屋“继成楼”，当时家乡还没有通公路，63岁的老教授走了15公里的山路回到了老家。他推开居室的窗门，感慨地说：“忆当年窗下读书，窗前有我手植的梅花树，花开时蜜蜂满树，花谢时结籽满枝。可惜现在梅树没有了，时光真如白驹过隙啊！”他来到村里的石楼小学，问校长自建国后村里一共出过多少大学生。他问乡亲们的医疗情况，还亲自为村里的老人看病。在家住了一晚，临行前对乡亲们说，我还会回来的。1986年12月，在新加坡的堂侄到北京探望病中的他时，还说：我明年4月就可以出院了，打算邀你们（子侄）一齐回家乡看看。对家乡的眷恋溢于言表。

粉碎“四人帮”以后，祖国各业并举，百废俱兴。1977年，为适应需要，钟惠澜领导下的热带医学研究室正式改为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他惟恐浪费有生之年的点滴光阴，总想抓紧时间再多搞几个研究课题。他亲自抓热带医学科研的实验室试验、临床诊断治疗、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治工作。直至病倒之前，他一直坚持全天工作，甚至连中午也不休息。他怕到食堂去吃饭耽误时间，就每天中午带饭。他甚至没有查找电话号码的时间，在家里，他把电话号码随手写在电话机旁的墙壁上；在办公室里，他的专用电话上贴满了写着电话号码的白色橡皮胶条。他每天要做的事很多，为了不搞乱各种材料和文件，他每天上班要带四五个大包，将各类材料分别带好。每当他下班回家走下汽车，不明底细的邻里总以为他是到哪出差刚回来。而在他家或办公室，到处都是翻开的书。

他长期是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保健医生之一，1976年在毛主席的追悼大会上，他代表毛主席身边的医务人员，登上天安门参加追悼会。

钟惠澜于1987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这位对人类医学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临终之际向人们提出的惟一请求，是将自己的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事业。

钟惠澜逝世的消息传到家乡，3月15日，中共三乡区委和三乡区公所、三乡诗文社在他的老家举



1980年在海南省乐东县为群众服务。



邹家华副总理为钟惠澜百年诞辰的题词。



《纪念钟惠澜先生百年诞辰》画册

行了隆重的缅怀集会，李懿征女士发来了致谢信。中共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卫生局的领导和三乡300多位乡亲出席了缅怀会。《嘉应乡情报》以《公在九天须早返，归来石屋慰离情》为题作了长篇的报导。

2001年，在钟惠澜诞辰10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他雕塑了一尊铜像矗立在北京大医院内，以纪念这位国际医学泰斗。1990年，北京大学组织出版了《钟惠澜传》，由彭真委员长题写书名。

2009年2月11日至18日，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莅梅视察。在视察东山教育基地时，迟浩田仔细观看了院士广场内的22位梅州籍国家院士碑林。当看到国际著名热带病专家钟惠澜的碑文时，他回忆起钟惠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援外治好许多非洲患者的事迹，称赞钟惠澜医疗技术精湛。

（作者为梅州市政协委员、梅县政协常委）

忆 父 亲

钟雪珍 钟铁珍 钟仁珍 钟天珍

1901年，父亲出生在葡属东帝汶叻利岛上的一个华侨家庭。他5岁丧父，全靠母亲带着6个兄弟姐妹，艰难度日。因家境贫寒，父亲直到13岁才上小学。但他自幼聪颖好学，又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故而异常勤奋，只用了3年，便读完了小学全部课程，且年年名列第一。

1917年，父亲回到祖国，就读于广东梅县广益中学，并被选为梅县学生联合会会长。由于品学兼优，毕业后，被保送到上海沪江大学，一年后即报名投考协和医学院。

赶考时正逢汕头海啸，轮船停运，当他赶到考场时，考试已进行了大半，但他坚持用一天多的时间答完所有的考卷，终被协和医学院录取。

在协和读书期间，由于经济困难，父亲不得不利用晚上的时间去教英文夜校。假期还到医院门诊做些杂务，如给患者叫号，进取病历，统计门诊人数，或在实验室里做些辅助工作，以此获得一些报酬。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了8年的医学学业。1929年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而被留在协和医院内科，从此开始了他献身于医学科学事业的一生。作为一个医学家，父亲在事业上的最大特点是，他毕生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非常支持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对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给予了热切的关注。1957年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父亲大声疾呼中国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他列举了大量数字，力陈人口盲目增长的危害。他当时算了一笔账：我国每年能有机会就业的职工仅有一百多万，而每年人口增长率为2%-3%，若政府对人口的增长不加以控制，今后每年将出现一千多万无事可做的人。他在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帮助下，根据对当时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分析，推算出今后的人口增长数字20年后，即1978年，中国人口将增加到9.3亿至11.4亿。这一预言，果然为20年



子女及外孙在北京友谊医院塑像前留影。



后的事实所证明。父亲的发言中，在批判马尔萨斯以战争、瘟疫、疾病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反动学说的同时，大胆指出：“马尔萨斯对于人口繁殖（若不加以控制的话）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是正确的。在经济和科学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情况下，工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是算术级数的，而不是几何级数的。”“中国人口基数很大，目前增长太快、太多，所以应该辨证地采取有计划控制生育的政策，以便积累大量资金，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早日完成。”父亲还从现代医学科学的角度，从妇女生理学、儿童营养学等诸多方面，有力地论证了人口盲目增长的危害性。



钟惠澜夫妇

1963年，在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上，父亲再次阐述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六点建议：强调“避孕是男女双方的事”，反对那种把避孕的责任都推到女方身上的错误观点；建议加强对避孕工具生产的领导和研究；建议修改婚姻法，将法定婚姻年龄适当推迟等等。

1980年5月，父亲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几点建议》，这是他第三次向国家和政府管理部门献计献策。他认为：要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就必须克服主观性和片面性，对人口及其相关的数字，一定要有精确的统计；要建立一支计划生育工作的专职队伍；要讲优生学，制定“老有所养”的政策；要学习外国节制生育的先进技术和有益之经验。

总之，父亲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形势下，他在控制我国人口增长和计划生育工作方面所持的观点，始终如一。如果不具备现代医学的先进理念，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一切恐怕都是很难做到的。几十年来，因其参与和推动了我国“控制人口、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形成，被学术界、医学界公认为这是他对国家和民族的一个重要贡献。受父亲控制人口增长观点的影响，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带头每人只生一个孩子。

对我们来说，父亲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优秀医学家，而且是一位充满爱心的慈父。他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格。特别强调如何做人，甚至包括我们几个孩子因何事出门、几点返家等这类生活小事，都不容许有半点含糊。铁珍、仁珍当年报考医学院之前，父亲都分别找他们谈话。他说：“这件事你们要仔细考虑，立志学医是好的，学成后能给千千万万的患者治病，解除他们的病痛。但要当一名好的医生又是不容易的，必须具备一颗善良的心，能为别人着想。把患者的康复



放在第一位。而做到这一点，就要做好受苦受累的思想准备。”铁珍、仁珍学医、从医30余载，把父亲的话一直铭记在心。

父亲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一直为人所称道。建国前，父亲给穷人看病，常常不收费。他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期间，将自己所得报酬，全部捐献给学校作为贫困生的助学金。当时的院长马旭问他：“有什么条件？”父亲答：“无。”马院长又问：“你要不要接见接受奖学金的学生？”答：“不要。”再问：“你要不要知道他们的名字？”他再答：“不要。”父亲的慷慨解囊，一方面缘于自己幼年时期，曾饱尝求学之艰辛；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他对祖国医学事业的无比热爱，愿尽绵薄之力，

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行列里来。

父亲工作起来是不知疲倦的，永远是那么专注、忘我。多少年来，从来没见过他喊过累，叫过苦。进入晚年的他，仍然坚持上整日班，中午吃过从家里带的简单饭菜后，在办公室休息片刻，便又马上投入到下午的工作中去了。晚上在家里要阅读专业书籍，修改学术论文或报告。常常是一盏孤灯陪伴到深夜。父亲自己的生活十分节俭，如把别人寄给他的信封翻过来再用，把用过的药口袋和日历翻过来当草稿纸。家里除了电冰箱和电视，家具基本上都是二手货。他把绝大部分的积蓄，都用来购买书籍和订阅期刊杂志。半个多世纪下来，藏书多达15柜，我们家无论是书房、客厅、卧室，甚至过道，到处摆放着他心爱的书籍。

父亲上了年纪后，每天由公家派车接送上下班，父亲从不让子女搭乘他的小车。有一次，仁珍右指手术缝合24针，麻醉还没有过去，她打电话问父亲的小车是否能顺路接她一下，父亲没有同意。生活中父亲不光是严格，还有着深深的爱。“文革”期间，天珍所患的肺结核病复发，父母非常焦急，而当时他们身体都有病，又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但是父亲执意和母亲冒着雪，连夜去找熟识的大夫。在凛冽的寒风中，昏暗的街灯下，老人留在雪地上的脚印，体现出父亲的爱子之情。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天珍每忆此事，依旧是激动不已。

父亲的业余爱好相当广泛，他年轻时和同学一起滑冰、游泳，参加英文演讲比赛，参加合唱团，演话剧等，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但后来因为忙于工作，只好把这些业余爱好都“牺牲”了。在过年或过生日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和我们一起享受弹琴、唱歌的乐趣。他的嗓子非常好，家里人唱歌谁也比不上他。打桥牌



是父亲另一大爱好，他稍有空闲便教我们几个孩子，并说：“输赢无所谓，主要是通过它学会动脑筋。”

1986年9月，父亲赴广州开会，在明知心绞痛已露先兆的情况下，却瞒着家人，带着氧气袋，抱病而行。由于他80多岁仍坚持超负荷工作，使病情加重，最终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不是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但无论如何也放不下自己为之奋斗了近60年的医学科学研究。在病榻上他索要研究资料，审阅助手的总结报告；关心《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出版情况；关注由他亲自指导编写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肺吸虫部分的修改稿；过问热带病研究所开辟的新课题及出版《热带医学和卫生学》杂志的进展。甚至包括给国内外众多同行、朋友签名的新年贺卡……。父亲要做的、要考虑的事是那么多；惟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也没有遵照医务人员的嘱咐安心静养。去世前几天，父亲提出死后做遗体解剖的请求，再为医学事业做出他最后的贡献。1987年2月6日，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今天，虽然父亲已远离我们而去，但他毕生从事的中国医学科学事业已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高速前进的历史新阶段，千千万万的优秀医务工作者在不断涌现，一批闻名中外的老医学专家继续书写着事业的辉煌，一批年轻有为的医生和医务工作者正在成长，当此之际，我们非常想说的一句话是：先父回眸应有笑，同志同道自有人。

（摘自《纪念钟惠澜先生百年诞辰》画册，作者为钟惠澜之子女）



钟惠澜与家人
(摄于1980年)